

热历史

观察天时始于冬至

赵柒斤

今年的冬至是12月21日，冬至是一年中寒冷时节的开端，但也是阴阳二气自然转化的时节。文人墨客们面临冬至节，难免感叹岁末与寒冬，吟诵冬至节带给人们的启迪与希望。正如中唐诗人权德舆《冬至宿斋时郡君南内朝谒因寄》所云：“明日一阳生百福，不辞相望阻寒宵。”

其实，古人最早的时间观念，与日、月两大自然标识有关，冬至便是先民观察天时的最早发现之一。《尚书·尧典》曰：“乃命羲和，钦若昊天，历象日月星辰，敬授民时。”意思是说，尧帝命令羲氏与和氏，敬慎地遵循天数，推算日月星辰运行的规律，制定出历法，敬慎地运用时节告诉人们。

西周将一年分为冬至、春分、夏至、秋分四个节点，此后据此推算其他节气，将太阳周年运动轨迹划分为24等份，对应二十四节气。《尚书·洛诰》说：周公“朝至于洛师”，对洛阳周边实地考察后，通过“土圭测景”选定洛邑基址。“土圭测景”目的是寻找中国地理中心，要义是“树八尺之表，夏至日，景长尺有五寸；冬至日，景长一丈三尺五寸”（即竖起高为8尺的标杆，在夏至日观测，中午的日影是1.5尺，冬至日中午的日影是13.5尺）。按周公“土圭测影”所定天下之中，西周人详细规划了灭商后的第一座国家都城。于是，周朝便把经土圭法测得的一年中“日影”最长的一天“冬至”标示为太阳新生、太阳往返运动进入新的循环，所以古人把冬至看作“大吉之日”。周朝还把经土圭法测得一年中“日影”最长的一天，作为新年开始的日子。

冬至过节，源于汉代。《汉书》不仅有“冬至阳气起，君道长，故贺”的记载，《汉书·武帝纪》还说，汉武帝在冬至这天，“立泰畤于甘泉”，早上拜日、晚上拜月。《后汉书·志·礼仪》中明确交代，汉代全国已放“冬至假三天”。至魏晋南北朝，“冬至”演变为区域性节日，老百姓用“绣日长一线”及“献履贡袜”等方式庆贺“冬”。明张岱《夜航船》卷一“冬”篇谓：“魏晋官中女工刺绣，以线揆日长短，冬至后比常添一线之功。故曰日长一线。”曹植《冬至献袜履颂表》云：“伏见旧仪，国家冬至，献履贡袜，所以迎福践长。”表明冬至献袜履为的是“迎福践长”，冬至穿上新鞋袜，踩踏日影上，纳受阳气，便可迎福除秽。



▲清代《管城春满消寒图》



▲九九消寒图



▲九九消寒图
新华社发 吕源作

到唐朝，冬至的地位提升至春节一样的高度，《唐六典》“吏部郎中”条云：“元正日、冬至日二大节准令休假七日。”当日，朝廷举办盛大宴会，文人墨客诗会冬至更空前，纷纷写诗作词称颂阳气回升，杜甫的“天时人事日相催，冬至阳生春又来”，让人在寒冬感到温暖，白居易的“邯郸驿里逢冬至，抱膝灯前影伴身”，使人体悟“每逢佳节倍思亲”，唐末诗人韩偓的“阴冰莫向河源塞，阳气今从地底回”，叫人看到春天来临。

市场经济快速发展的宋代，便将冬至开发成“消费节”“狂欢节”。宋孟元老《东京梦华录》卷十谓：“十一月冬至。京师最重此节，虽至贫者，一年之间，积累假借，至此日更易新衣，备办饮食，享祀先祖。官放关扑，庆贺往来，一如年节。”偏于一隅的南宋更是将冬至做成“馄饨节”。宋词中的“冬至”要么“一阳萌生从此日”，要么“阴阳伏升淑气回”，要么“一点青阳，早梅初识春风面”，普通百姓除穿新衣、享美食、祭祀先祖等，还传唱《数九歌》。苏东坡的弟弟苏辙还专门写下《冬至日作》：“似闻钱重薪炭轻，今年九九不难数。”

明清时期的冬至，京津地区的民间流行贴绘“九九消寒图”。明刘侗、于奕正《帝京景物略》卷二“城东内外”条载：“日冬至，画素梅一枝，为瓣八十有一，日染一瓣，瓣尽而九九出，则春深矣，曰九九消寒图。”清富察敦崇史料笔记《燕京岁时记》还介绍了《消寒图》具体涂法：“上阴下晴雪当中，左风右雨要分清，八十一全点尽，春回大地草青青。”

古人认为，冬至是阴阳二气变化的关键节点，当日阴气虽处于最高值，却也是阳气萌生之始，正所谓“不贺其盛而贺其发端者，古人月恒日升之义也”。在最寒冷季节营造新期待的心境，进而带来一种共同的感受，阳生春来，温暖的阳光终会普照大地。（《北京青年报》）

不少人知道姜太公，因为“姜太公钓鱼，愿者上钩”的俚语耳熟能详。可说起吕尚，很多人就不知道了。其实，吕尚就是姜太公，姜为姓，吕为氏，尚为名，史上多称吕尚。西周初年，吕尚被周文王封为太师，辅助文王，与谋“翦商”。文王后，他又辅佐周武王灭商，因功封于齐，成为周代齐国的始祖。

从史料记载看，吕尚一生著述不多，但其最有名的兵书《六韬》，较为全面地论述了其治国理军和指导战争的理论、原则和方法，使其成为中国历史上极享盛名的政治家、军事家和谋略家。不过，后世曾有人考证认为，《六韬》非吕尚亲撰，而是战国时有人伪托于吕尚的著述。然而，司马迁在《史记·齐太公世家》中说：“后世之言兵及周之阴权，皆宗太公为本谋。”由此可知，无论《六韬》是不是吕尚亲笔所著，其内容反映的基本上是吕尚的军事实践活动及其韬略思想。

《六韬》分为《文韬》《武韬》《龙韬》《虎韬》《豹韬》《犬韬》六卷，共60篇，其中第10篇为《举贤》，主要阐述了举贤尚功、重用人才的主张。周公问：“何以治齐？”太公曰：“举贤而尚功。”所谓“举贤”，就是推举贤能之士，把那些有才能、有智慧，能带领齐国百姓发财致富的人推举出来，委以重任；所谓“尚功”，就是以功绩论英雄，奖赏那些受到百姓拥戴的人，既包括物的赏赐，也包括人的重用。无论“举贤”还是“尚功”，都不分部落、出身、门第，一律凭“贤”论举、凭“功”论赏。吕尚还认为，只要君王和各级官员都能“举贤尚功”，就能改变国家“负海洪凶，少五谷而人民寡”和“辟草莱而居”的落后局面，使国家强盛起来、人民富裕起来。

在吕尚的用人思想中，对“贤”有着具体明确的衡量标准。其中最重要的，莫过于他所说的“六守”，即“一曰仁，二曰义，三曰忠，四曰信，五曰勇，六曰谋”。这“六守”，虽然浸透着浓郁的儒家学说气息，但也可以从中体味到吕尚心中的贤人标准。吕尚始终认为，贤人要合于仁义忠信，要有勇敢精神和聪明才智。由此亦可看出，任人唯贤的用人路线，在我国有着悠久历史，可谓根深蒂固、源远流长。（《今晚报》）

生活史 宋朝老年人的福利

吴钧

宋朝的老年人有福利，即老有所养。根据北宋末的一项立法：“居养鰥寡孤独之人，其老者并年五十岁以上，许行收养，诸路依此。”（元·郑元佑《遂昌山樵杂录》）凡50岁以上的鰥寡孤独老人，可以进入国家在京师及诸路开设的福利院养老。国家给他们的养济标准一般为每人每日一升米，10文钱；对80岁以上的居养老人，政府还有额外补助，另给大米及柴钱；90岁以上老人每日有酱菜钱20文，夏天给布衣，冬季给棉衣。后来因为要收养的老人太多，又将进入福利院的年龄线提高到60岁以上。

宋政府设在京师的福田院，是一个综合性的收养机构，包括收养孤寡老人。据《宋史·食货志》载：“京师旧置东、西福田院，以廩老、疾、孤、穷、丐者，其后给钱、粟者才二十四人。英宗命增置南、北福田院，并东、西各广官舍，日廩三百人。岁出内藏钱五百万给其费，后易以泗州施利钱，增为八百万。”宋初时东、西福田院只能赡养24人，规模非常小，后来经过扩建，每院可收养300人，东、西、南、北四院共可收养1200人。

北宋后期，宋政府又在天下各州县广建居养院，这也是综合性的福利院，包括收养“贫乏不能自存”的老人。甚至人口规模较大的城寨镇市也建有居养院，因为朝廷要求“城寨镇市户及千以上有知监者，俱仿州县例置居养院”。（宋·李焘《续资治通鉴长编》卷八八）居养院有专项的财政拨款：“以户绝财产给其费……阙者不足者以常平息钱充。”（宋·李焘《续资治通鉴长编》卷五〇三）在宋代，绝户人家过世之后，财产会被收归国家财政，这笔财政收入通常会用于公益救济，回馈社会。

此外，还有一些地方政府修建了“安老坊”“安怀坊”“安济院”，都是专门的养老福利机构。那么宋政府推行养老福利的效果如何呢？总体上看，效果是良好的，宋人说：“鰥寡孤独居养安济之法，自崇宁以来，每岁全活者，无虑亿万。”一些地方甚至出现了“过度福利”的弊病，如在绍兴府，“居养院最侈，至有为屋三十间者。初，遇寒惟给纸衣及薪；久之，冬为火室给炭，夏为凉棚，什器饰以金漆，茵被悉用毡帛，妇人、小儿置女使及乳母，有司先给居养、安济等用度，而兵食顾在其后”。（宋施宿等《嘉泰会稽志》卷一三）这种“过度福利”现象，在今日西方福利国家很常见。（《联谊报》）

史海钩沉 吕尚的“举贤尚功”

胡建新

不少人都知道姜太公，因为“姜太公钓鱼，愿者上钩”的俚语耳熟能详。可说起吕尚，很多人就不知道了。其实，吕尚就是姜太公，姜为姓，吕为氏，尚为名，史上多称吕尚。西周初年，吕尚被周文王封为太师，辅助文王，与谋“翦商”。文王后，他又辅佐周武王灭商，因功封于齐，成为周代齐国的始祖。

从史料记载看，吕尚一生著述不多，但其最有名的兵书《六韬》，较为全面地论述了其治国理军和指导战争的理论、原则和方法，使其成为中国历史上极享盛名的政治家、军事家和谋略家。不过，后世曾有人考证认为，《六韬》非吕尚亲撰，而是战国时有人伪托于吕尚的著述。然而，司马迁在《史记·齐太公世家》中说：“后世之言兵及周之阴权，皆宗太公为本谋。”由此可知，无论《六韬》是不是吕尚亲笔所著，其内容反映的基本上是吕尚的军事实践活动及其韬略思想。

《六韬》分为《文韬》《武韬》《龙韬》《虎韬》《豹韬》《犬韬》六卷，共60篇，其中第10篇为《举贤》，主要阐述了举贤尚功、重用人才的主张。周公问：“何以治齐？”太公曰：“举贤而尚功。”所谓“举贤”，就是推举贤能之士，把那些有才能、有智慧，能带领齐国百姓发财致富的人推举出来，委以重任；所谓“尚功”，就是以功绩论英雄，奖赏那些受到百姓拥戴的人，既包括物的赏赐，也包括人的重用。无论“举贤”还是“尚功”，都不分部落、出身、门第，一律凭“贤”论举、凭“功”论赏。吕尚还认为，只要君王和各级官员都能“举贤尚功”，就能改变国家“负海洪凶，少五谷而人民寡”和“辟草莱而居”的落后局面，使国家强盛起来、人民富裕起来。

在吕尚的用人思想中，对“贤”有着具体明确的衡量标准。其中最重要的，莫过于他所说的“六守”，即“一曰仁，二曰义，三曰忠，四曰信，五曰勇，六曰谋”。这“六守”，虽然浸透着浓郁的儒家学说气息，但也可以从中体味到吕尚心中的贤人标准。吕尚始终认为，贤人要合于仁义忠信，要有勇敢精神和聪明才智。由此亦可看出，任人唯贤的用人路线，在我国有着悠久历史，可谓根深蒂固、源远流长。（《今晚报》）

古事汇

“清朝第一词人”——纳兰容若

吴天荣

世人都说贾宝玉情根深种，是第一情痴，但如果贾宝玉遇到了纳兰容若，恐怕亦当避席。也有人说纳兰容若是贾宝玉的原型，对此，我是不敢苟同的。其一，贾政的官职是工部员外郎，从五品；纳兰容若的父亲纳兰明珠历任内务府总管、刑部尚书、兵部尚书。官职甩贾政几条街。其二，纳兰容若文武双全。论武，他是康熙的贴身侍卫，曾随康熙南下江南，北征塞外。“山一程，水一程，身向榆关那畔行，夜深千帐灯”。论文，其词是“北宋以来一人而已”，也不是贾宝玉这个富贵闲人可比的。

纳兰容若用今天的话来说，那是典型的“别人家的孩子”，妥妥的学霸，励志典范。明明含着金钥匙出生，可他比常人更努力、更勤奋。自幼饱读诗书，文武兼修，十七岁入国子监，被祭酒徐元文赏识。十八岁考中举人，次年成为贡士。康熙十五年

（公元1676年），考中第二甲第七名，赐进士出身，授三等侍卫。曾于两年中主持编纂了儒学汇编《通志堂经解》，深受康熙帝青睐。“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鼾睡？”有人揣度康熙重用纳兰容若，令其寸步不离左右，或许有人防人之心，可见纳兰容若是何等等的志存高远，才情不凡。

纳兰容若的词作为多友情词、边塞词和悼亡词。其友情词深沉磊落，有东坡、稼轩之风；其边塞词多凄黯苍凉，在边塞诗词中亦别具一格；其所作悼亡词血泪交织，尤为感人。“人生若只如初见，何事秋风悲画扇。等闲变却故人心，却道故人心易变。”“初见”是什么？是贾宝玉初见林黛玉的似曾相识？是杨玉环对唐明皇的回眸一笑？还是陆游唐婉沈园意外重逢的惊鸿一瞥？不是，都不是。

“初见”是纳兰容若对感情的一往情深，一眼万年，痴情成殇，思泪成河。纳兰容若一生经历3段刻骨铭心的感情：青梅竹马的表妹，入选

后宫，相见无语；情投意合的妻子卢氏，英年早逝，阴阳两隔；江南才女知己沈宛，南北相望不相见。“一生一代一双人，争教两处销魂。相思相望不相亲，天为谁春。”面对命运的不公，世事的无常，纳兰容若绝望呐喊，质问苍天。每一段感情纳兰容若都倾情付出，深陷其中，至死不渝，连父亲都说他“太过伤感”。纳兰容若句句血，字字泪，声声泣地写下300多首感天地泣鬼神的追思词，成就了“清朝第一词人”。“为伊消得人憔悴”，也殚精竭虑地走完了他31年的短暂人生。

月有阴晴圆缺，年有春夏秋冬。花开花落，云聚云散，这些无常又有常，世间最无常善变的是人心。“日月两盏灯，春秋一场梦。”但，纳兰容若是例外。秋风画扇犹可悲，更可悲的是纳兰容若穷其一生没能走出相思的苦海，没能走出生死离别的伤痛。“天若有情天亦老”。纳兰！纳兰！如果有来生，请你不要太多情。（《十堰晚报》）